

石刻考工录

曾毅公辑



石刻考工录

曾毅公 辑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shí kè kǎo gōng lù

石刻考工录/曾毅公辑。—北京：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7.7

187页，32开

曾毅公（1903～）中国图书馆学、金石学研究者。

1.40元

I. 石… I. 曾… II. ①石刻—工匠—人名录—中国—古代
②工匠—石刻—人名录—中国—古代③人名录—工匠—石刻—
中国—古代

N. K877.44 26.32945 K87

石 刻 考 工 录

曾毅公 辑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（北京文津街七号）

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

河北省涿县西辛庄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787×1092毫米 32开 8.3125印张 142千字

1987年7月北京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500 册

统一书号：17201·105

定价：1.40元

出版前言

《石刻考工录》是曾毅公先生在六十年代编成的《石刻工录》的基础上加工完成的一部资料，是他从事石刻整理研究工作几十年的成果之一。现经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王巽文、冀亚平等同志将其大部与馆藏碑帖拓本及有关著录核对，并统一体例、编制索引，刊布于世，以供学术界参考利用。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

自序

(一)

现在保存的古器物中，留下的铭刻文字比名书法家手写的墨迹要多得多。名家墨迹是越古老越少，我们若要普遍地观察了解古代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书，就不能不依靠流传下来的铭刻或拓本。这些铭刻文字或拓本，是否保存了原书写者的形象和神韵，那又和镌刻者技术的优劣有关。无疑，现在保存下来的铭刻文字，上自殷墟甲骨，下至近代石刻，他们的镌刻技术，属于优秀的占绝大多数，因此较为人们所注意和欣赏。今试举几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。

1. 在甲骨文字里有几片朱书未刻的文字，我们用它和已刻的刻辞比较，它们除去字的大小有些不同外，其笔法、字形、神气等等，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。

2. 以湖南长沙仰天湖五里牌出土的竹简，和安徽寿县出土的一批楚铜器铭文相较，两者在形体上也没有什么不同。

3. 以甘肃敦煌和内蒙居延等地所出土的汉代木简、朝鲜乐浪出土的汉漆器上面书写的文字，与汉礼器、曹全、孔宙等碑刻，以及蜀中神道阙的题字相互比较，其书写与镌刻，除文字的大小悬殊外，形体上毫无二致。

4. 将唐释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，大雅集王羲之书福兴寺碑，宋刻的大观帖，明刻的快雪堂，清刻的三希堂、秋碧堂等帖，和传世的王羲之墨迹、陆机的平复帖、杜牧的张好好诗等真迹比较，除墨色浓淡，无法传出外，镌刻与原迹没有什么不同。

镌刻者把他们的精神、智慧和技巧都集在刀锋上，用凝重、精确的刀法，刻出与原迹相同，神形并茂的复制品，真是“鬼斧神工”，“传神阿堵”了！而劣工作品，所谓“失神”、“走样”的，则一看就会明显地区别出来。如魏墓志中的侯刚、常季繁二志，聚优劣两刻手，展示在一方石版上，便是很好的例子。这两方墓志，所书写的文字，均出于名家之手，但占全石四分之一的左上角一部分，和其余四分之三部分，字迹的优劣，实有天壤之别。但这并不是两个人书丹，而是更换了刻工。镌刻的惯例，是把文字直接用朱色书写在石版上（后来则是把写在纸上的文字，从背面的字迹上进行双勾，然后填朱过在石上），再薄薄地施上一层蜡，以保护朱书不致模糊。刻时一般是由左而右，由上而下，但根据刻工个人习惯，也有先下后上，先右后左的。上述两方墓志，是用一贯的方式，似乎左上角已经刻成，发现刻工不佳，因之更换了技术较高的刻手，而后完成。从这两方墓志上，我们清楚地认识到：镌刻的优劣，对保存真迹的本来面目，是何等密切和重要！

镌刻工人精美、准确、熟练的技巧，是要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和学习才能练就的，一件完美的作品更是如此。我们看甲骨中“干支表”的习刻，歪七扭八的字体，大小不均的字形，横竖尚且不平不直，更不要再提行气了。但是中间夹杂

着整齐、平正的文字，无疑是师傅作出的示范。我们再看北京市房山县云居寺石经，有的经版背面，将“田”、“正”二字，一连习刻了几十次，其他文字，也刻了不少。其笔画不正规、不匀整的状况，说明是学徒工正在一笔一画地练习。另一石版上，忽而几句佛经，忽而一首绝句，有的是端端正正的“馆阁体”，有的是潇洒风流的“瘦金书”，这显然是另一情景。虽然在镌刻功夫上，有的已渐趋成熟，但也有的是“蚕头鼠尾”，仍欠佳妙。可见，要刻成一片完整、美善、不失原神的作品，是多么不易！

相传曹魏时大书法家钟繇，每有得意的作品，就亲手刊刻。唐代颜真卿所书写的碑刻，则是出自他两个精于镌刻的侍从（也有传说是颜自刻的，但恐非事实，如《李玄靖碑》文中“真卿与先生门人中”句，因书丹时遗落一“生”字，他在已写的“门人中”三字上压写了“生门人”三字，结果刻为“闰闪束”。如果是自刻，则决不会把压改的原形都刻了出来），所以颜碑没有刻碑人的名字。只有《千福寺多宝塔碑》署名史华刻。但也有可能，史华就是颜的侍从之一。李邕所书碑文，《少林寺戒坛铭》的刻者为伏灵芝，《娑罗树碑》为元省己，《麓山寺碑》为黄仙鹤。他们都是北海自己的化名。这种自书自刻和熟习书法的刻手，当然其笔法、笔意、神韵等等，都能从刀锋上表达出来。又如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、褚遂良，他们的碑刻，一部分就出自镌刻名家万文韶之手，晚唐柳公权所写的碑铭，大多是邵建初、邵建和兄弟手刻，元代赵孟頫所有碑铭，只有茅绍之所刻，才能显示出子昂超逸、俊俏的神韵，近代书法家秦树声的墨迹，因为他不善于用硬毫，时有弱笔虚锋，但是他写的墓志，一经翰

墨斋李月庭刻出，虚锋尽去，形成瘦硬挺拔，拓本反胜墨迹；赵世骏如果不请文楷斋刘明堂镌刻，他就拒绝书写。于此可知，镌刻人精湛的技艺，对于表现书法家书丹的形、神是何等的重要。

殷周甲骨、青铜的铭刻，因为铭辞简短，还没有把镌刻工人的姓名附刻在铭文里。因之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具有无上智慧、勤劳的劳动工人的姓氏。战国以后，开始了对于制造、镌刻者的重视，绝大多数的石刻和少数铜器、漆器的铭文上，附入了刻工们的姓名。所谓“物勒工名”，意即在此。隋唐时代此风逐渐兴盛，再以后，附在铭刻上的工人名字，则由个体而扩大为一家一族，由一家一族而扩大为一个集体。如祖孙、父子、叔侄、翁婿、师徒、兄弟等等，同事工作的，已指不胜数。武威安瓦族人从事镌刻工作，几乎延续了全部北宋时代。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，其采石、磨碑、镌刻，有种种不同的分工，仅就辽、金两朝镌刻工人计，就包括了两三百僧俗的几辈人。这种一家、一族、一大聚落的工人集体，和南宋的临安、麻沙等地，聚集了不知数量的刻书工人是一样的。他们所用原料有木、石的不同，但作为文化、艺术宣传工作，都起着同等的伟大作用。

云居寺的石经，是经历了隋、唐、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七个朝代，历时一千一百多年，经父子、兄弟、师徒等一代一代的集体劳动和创造，在一个地区，镌刻了一千部以上的佛教经典和同时代的历史文献，才著成了世界上罕见的一批文化遗产。陕西长安的碑林、河南洛阳的龙门、山东曲阜的孔庙和孔林的石刻群中所展示的碑碣雕刻，有的是原来聚集在一个地区，有的是从不同地区搜来集中的，有的是各朝各

代的个体制造，有的是集体的合修，但不管情况如何，它们在形制、花纹、字体的衍变，文献年代的考订，丰富文化史、美术史、雕刻史内容等等方面，都能提供大量的、真实的第一手资料。

(二)

版本、目录学的学者，根据宋、元、明、清各朝代书刊上的“牌子”、刻工、书体、纸张、墨色等等，考订书刊的版本时代、地区等内容，被公认为是科学的方法。碑刻因为长期矗立在风天雨地之中，斑剥、磨泐，以至残毁者更盛，拓本的早晚、精粗，又有显著的不同。因此，只据碑刻资料本身来作考订工作，有时比起书刊版本的考订，还要麻烦得多。但碑刻上镌刻工人的数量，并不少于书刊，所以如果我们把碑碣刻工整理出来，作为考订碑版年代的标准条件之一，也可以发挥良好的作用。

在历代的著录中，专门记录巧工、哲匠的书籍并不很多。他们虽然贡献了无穷的智慧和劳动，但并不为士大夫阶级的学者所重视。在一些笔记、杂谈中偶尔一见，也被他们说成是“玩物丧志”，斥为“奇技淫巧”。治印一门，因与文人墨客有特殊关系，故文人墨客用“游于艺”的态度相互习作，他们虽然也认为治印是“雕虫小技”，但并“无伤大雅”。所以“印人传”才万幸地被列入著作之林。近百年来，这种无视工人伟大创造的恶习有所改变，反映刻工的著作开始增多，朱启钤、梁启雄等的《哲匠录》、李放的《中国艺术家征略》、阚铎的《金石考工录》，先后出版传世。清道光六年

(公元1826)，海盐黄锡蕃辑著的《刻碑姓名录》，自汉迄元，著录镌工四百二十五人。戊申（道光二十八年，公元1848），黄把稿本送给当时金石学家刘喜海审阅，刘补充了一百八十九人。咸丰元年（公元1851），黄氏逝世，此稿就留在刘氏手中。刘在这个稿本的前面，有一小跋，写道：“道光戊申三月，余勘海塘，过盐官访黄椒升。椒升三十年春明旧雨也，年开九袞矣！精神矍铄，好学不倦，出所辑《刻碑姓名录》三卷视余，时传书填委，未暇检阅。己酉罢官家居，因检所藏碑刻，为补录之，得若干条，行将寄椒升付梓，昨闻已作古人，曷胜惋惜！余当再详为补辑成书，刻以传之，庶慰老友之志也。咸丰建元八月中秋日，喜海志。”

这个稿本，刘氏并没有刊刻成书，后辗转递藏于翁同龢、费寅二氏之手。翁又补入十五人，费亦补十人，总得六百三十九人。稿本上眉批目注，朱墨斑烂，尽是名家墨迹，现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。一九一〇年左右，上元宗氏据黄氏另一稿本辑入《咫园丛书》，版已镌就，却因故未能印行。后书版归叶氏景葵，叶将该书版捐献与上海图书馆。顾廷龙先生为其加刻了书衣、题记，于一九五九年由北京市中国书店刷印出版行世。

宣统年间(公元1909—1911)，长洲叶昌炽所著《语石》出版；在卷六中有五条是专谈镌刻工人的。当时黄氏书尚未问世，所以在书刊上首先提到镌刻工的应当是叶昌炽。叶共得镌刻工八十二人。阚铎的《金石考工录》，大约出版于一九三〇年左右，收镌刻工二百十四人。本人因工作需要，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〇年，日与铭刻拓本为伍，间或也到穷山幽谷、墓道林间访碑寻古，对这些古代铭刻遗物的制

作、形制、纹饰、文字等等，都有浓厚的感情和兴趣，随手也搜集了石工铸匠的姓名，作为个人研究铭刻的一种工具。取叶、黄、闾诸氏成书来校勘，所得比前者增加了一倍以上。

这一本小册子收集到的镌刻工人，总计近一千八百人，引用碑刻目九百余条，其中已见于前人著录的，则注出前人录出的姓氏；未注出姓氏的，为笔者所补出，计镌工九百一十人。本人深知，这个小册子因为个人的水平和所见不广，尚有很多遗落，希望同好者予以指正和补充，幸甚幸甚。

曾毅公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五日

凡 例

《石刻考工录》是集录石刻镌制者的专著。上起汉魏、下迄明清，历时近二千载，收录近一千八百人。其编辑规则如次：

1. 考工录体例，按刻工所镌作品的时间顺序排列。墓志普遍无刻制年月，多按葬年排列。

2. 若一人刻数石，集中后按年代顺序排列。与他人合刻者，另行排列。

3. 刻制时间（年、月、日）完全相同者，按刻工姓氏笔画排列。笔画以北京图书馆一九七四年编制之《中文图书卡片目录检字表》为准。

4. 石刻只有镌刻朝代无年者，列于朝代之后；有年无月者，列于其年之后；有年月无日者，列于年月之后；朝代年月日均无者，列于最后。

5. 房山石经之刻工，只列姓名，不著所刻之经目。

6. 凡叶昌炽、黄锡藩、翁同龢、刘喜海、闾铎、费寅等人的著述已收之刻工，本书在相应条目之后，分别注明叶、黄、闾等姓氏，以明前人之功。

7. 书末附人名笔画索引。

目 次

出版前言.....	(1)
自序.....	(1)
凡例.....	(8)
汉.....	(1)
三国.....	(2)
魏.....	(2)
吴.....	(2)
南北朝.....	(3)
宋.....	(3)
梁.....	(3)
北魏.....	(3)
东魏.....	(4)
隋.....	(4)
唐.....	(5)
附：大理.....	(25)
五代十国.....	(26)
后梁.....	(26)
后唐.....	(27)
后晋.....	(27)
后汉.....	(27)
后周.....	(28)
吴.....	(28)
南唐.....	(29)
吴越.....	(29)

闽.....	(29)
南汉.....	(30)
蜀.....	(30)
宋.....	(31)
北宋.....	(31)
南宋.....	(67)
附：齐.....	(77)
辽.....	(77)
金.....	(82)
元.....	(95)
明.....	(129)
清.....	(137)
无纪年.....	(151)
人名笔画索引.....	(153)

石刻考工录

曾毅公 辑

汉

宋高（工）

元和四年（117）刻祀三公山碑。

孟孚（石工） 武卯（石工） 孙宗（石工） 卫改*（良匠）

建和元年（147）三月四日孟孚、武卯造武氏祠石阙，孙宗造石狮子，卫改刻武梁祠碑。

黄

*黄锡蕃云：“武梁碑不著刻碑人姓名，碑文中有‘良匠卫改，雕文刻画，罗列成行’句，故列一家，以著刻碑姓名。”

邴邴公修（颖川） 苏张

延熹八年（165）四月二十九日同刻西岳华山庙碑。

黄、叶、阙

陈兴（工）

熹平四年（175）刻石经论语。

黄

王明（石师）

光和六年（183）刻白石神君碑。

叶、黄

刘武(良)* 刘盛（造石工）

建安十年（205）三月上旬刻巴郡太守樊敏碑。

黄

• 《庚子销夏记》云：“所收本无一残缺，题额及镌书人刘武良名俱全。”黄锡蕃云：“隶释载造石工刘盛不著明镌建人，亦非刘武良也。姑存之以俟考。”

三 国

魏

钟繇*

黄初二年（222）刻受禅表。

黄

• 黄锡蕃云：“《庚子销夏记》云：‘余按此碑昔人谓：王郎文、梁鹄书，钟繇刻石，为三绝’。”

吴

朱□（九江巧工）

天玺元年（276）刻天发神讖碑。

闾

殷政（刻工） 何赦（刻工）

天玺元年（276）同刻禅国山碑。

黄、闾

南北朝

宋

杜苒子（匠碑* 府主簿益州）

大明二年（458）九月刻爨龙颜碑。

叶

- “匠碑”当即碑匠。

梁

邵元明（吴兴）

普通三年（522）十一月八日刻始兴忠武王碑防阁字。

刘

房贤明（丹阳）

普通三年（522）十一月八日* 刻始兴忠武王萧憺碑。

黄、阙

- 立碑年月据《江苏金石志》。

北魏

荔非薄非（石师统宁戎） 荔非辅（正宁戎桃谷） 荔非归□

（□宁戎即水）